



潘洪萱

朱钟棣

郭羽诞

关于科技进步与推进上海传统出口商品更新换代

1996年上海市的外贸出口取得了重大成绩,在全国出口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上海的出口连续12个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去年上海出口总值达132.38亿元,比前年增长14.3%,在全国仅次于年出口增幅达39.8%的天津,排名第二。但是从出口值的绝对额来看,情况并不乐观;去年广东省的出口总值达590.99亿美元,超过上海4.46倍。另一个出口大户江苏省也追了上来,出口总值达131.22亿美元,仅比上海少1.16亿美元,与上年相比增幅也达11.3%。此外,出口额超过100亿美元的还有山东省和福建省,分别有108.61亿和100.00亿美元,与上年相比的增幅也分别有12.6%和7.2%。出口额接近100亿美元的有浙江省和辽宁省,分别有93.34亿和83.38亿美元。在各种比较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1996年上海出口的高速增长并不意味着我市的出口贸易已经进入新的增长轨道,也不意味着上海在全国出口贸易中地位下降的趋势得到了根本的扭转;相反,对出口增长情况的详细分析表明,上海出口商品的结构处于较低水平,出口商品档次不高,新产品的更新换代缓慢,出口后劲不足;如果不及时解决好这些问题,上海的出口贸易就不能从目前的发展轨道上提速,在全国出口贸易中的地位还会下降。上海出口贸易能否在下一世纪进入新一轮的发展轨道,关键是在世纪之交的这几年中能否加快科技进步,继续推进传统出口商品的更新换代。

一、上海出口贸易的现状

1. 出口商品的结构处于低水平

上海出口商品的低水平结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的轻纺产品占了出口商品总值的三分之二左右,以中低档为主的轻纺产品使整个出口商品结构处于低水平。1996年上海出口服装34.07亿美元,纺织品17.45亿美元,文体用品6.52亿美元,箱包及鞋类5.81亿美元,日用杂品4.41亿美元。这些传统的轻纺产品占了出口总值的三分之二左右,仍是出口换汇的大头。而电讯设备及器材只有7.2亿美元,家用电器只有5.65亿美元,船舶只有4.15亿美元。这三类附加值较高的出口产品仅占1996年上海出口总值的11.4%。而服装和纺织品仍是上海1996年的第一大出口商品,占了出口总值的34.6%。这个比重,虽然比1990年的40.7%、1994年的41.4%和1995年的36.9%有所下降,但下降的速度不快。相反,机械产品和运输工具的出口比重在1995年只有13.3%。上海出口商品的低水平令人担忧,机电产品出口比重的过小尤其令人担忧。

(2)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低附加值低档次产品占有很大比重。机制品和初级产品的划分只是一种对出口商品结

构的粗浅划分。根据这个划分,机制品已经在上海 1996 年的出口商品中占了 92.7% 的比重,出口商品的结构水平似乎很高。但是,上海出口的机制品大部分仍是劳动密集型或低附加值低档次的制成品。例如,我国出口的纺织品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商品。按吨纤维美元计算,1993 年意大利最高,达 22000 美元,美国为 17400 美元,日本为 14000 美元,香港为 11400 美元,而我国只有 8700 美元,是世界平均吨纤维换汇美元数的三分之二。出口的纺织品中低档和中档的产品占多数,而深加工高附加值的服装占的比重不大。

(3)机电产品出口比重提高不快,高附加值高技术的机电出口商品占的比重太小。近年来,在市委和市府的领导下,上海的机电产品出口增长迅速。包括运输工具、机械设备和仪器仪表在内的机械类产品,1990 年出口值只有 4.32 亿美元,1995 年达 11.83 亿美元,1996 年达 17.54 亿美元。但是,机械产品占上海出口总值的比重太小,增长速度也太慢。分别只占各年上海出口总值的 8.1%,11.9% 和 13.3%。整个机电产品在 1996 年的出口值虽然达到 39.36 亿美元,但占上海出口总值的比重只有 26.4%。应当说,上海出口的机电产品普遍存在着技术水平低和附加值低这种“双低”现象。贸易条件十分不利。

(4)上海的六大支柱产业尚未形成出口能力。1995 年上海的汽车制造业,电子电讯设备制造业,电站成套设备制造业,家用(电子)电器制造业,石油化工与精细化工制造业,以及钢铁工业的产值在上海工业产值中占了 45%,1996 年提高到 52.75%。但六大支柱产业出口能力低下。

2. 传统出口商品的优势和竞争力均有所下降

上海传统的出口商品中优势产品地位削弱,具体表现在缺乏有影响的品牌,靠低价倾销打开销路而不是靠质量和档次取胜。

(1)纺织品出口以纱布和低档服装为主,附加值不高。纺织品是我国也是上海传统的创汇产品。1978 年我国出口纺织品和服装 24.31 亿美元,1988 年达 113.3 亿美元,1992 年 253.35 亿美元,1994 年 355.48 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 29.37%。而上海的这个比重更高,1995 年和 1996 年上海出口的纺织品和服装占出口总值的比重在连续几年下降后还有 36.9% 和 34.6%。问题在于这些纺织品档次价低而缺乏创汇能力。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纺织品和服装前向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原料面料低劣,后向加工的深度不够,牌子不响,价值不高。

(2)轻工业产品的出口优势因为低附加值,低档次和低卖价这种“三低”状况而下降。轻工业品一直是上海出口的大头。近年来占出口额的比重始终在 22% 左右。轻工业品的出口不但以低附加值,低档次和低卖价的“三低”产品为主,而且这种“三低”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情况十分堪忧。例如,1994 年和 1995 年上海分别出口了自行车 138 万辆和 168.7 万辆,平均每辆的卖价从 42.2 美元下降到 33 美元,售价大大低于国内的批发价。又如,这两年多功能缝纫机的出口量从 2917 架猛增到 36443 架,但每架的售价却从 72 美元猛跌到 36 美元以下,价格跌去百分之五十。95 年仅仅出口彩电 20168 台,每台平均创汇不到 92 美元;出口录音机 138243 台,平均每台创汇才 21.8 美元;出口电冰箱 13539 台,平均每台 98.3 美元。

(3)出口的农副产品仍以加工程度低的原料为主。虽然农副产品在上海的出口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从 1994 年的 10.3% 和 1995 年的 10.14% 下降到 1996 年的 3.27%,但是原料型的农副产品加工程度低,换汇能力自然也低。例如,1994 年和 1995 年上海出口的芝麻平均每吨才换汇 678.65 美元;出口的薄荷脑每吨才 1.23 万美元;出口的活鳊鱼每吨才 1.615 万美元。这些农副产品的出口不但价值低,而且耗竭资源。

二、加快科技进步推进上海传统出口商品更新换代的几点对策

1. 上海出口商品更新换代的方向和重点

上海传统的出口商品,如劳动密集的纺织、轻工产品,由于上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高,已日益失去其比较优势。单靠这些传统的出口产品,无论如何也不能支持上海外贸持续高速增长,因此,使上海传统出口商品更新换代,寻找新的重点出口产品,也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

在选择新的出口主导型产业的时候,日本、韩国等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参考。在50年代时,日本在确立了建立外向型经济的目标以后,曾面临着应优先发展哪些出口商品的问题。当时日本的主要出口商品还是传统的纺织、轻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日本的经济学家认为,这些传统的出口产品作为生活的必需品,其收入弹性是比较小的。也就是说,从总体上说,当国民收入增加时,对这些产品的需求不会同比例增加,因此这些产品不能支持日本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他们认为,只有那些收入弹性比较大的产品才能保证日本出口的高速增长。因为收入弹性大就意味着当国民收入增长时,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增长率会大大高于收入增长率。反映到生产上,就是这些产品的生产增长率,必须是大大高于社会平均的经济增长率。所以日本应该大力支持、培养高收入弹性的产品的生产,把它们作为日本今后出口的主力。当时根据这个认识,日本选择了钢铁、重化、半导体、家电、汽车等产业作为重点扶植对象,积极引进技术、组织生产,只10年左右的时间,这些产品就成为日本出口的主力,甚至有的产品在市场上独占鳌头。韩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受到日本经验的启示,在经济起飞的时候也及时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把生产从劳动密集的低收入弹性产品转移到高收入弹性的产品上。现在,韩国的电子产品、汽车等已成为主要出口产品。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上海在调整出口产品结构时,也应重点考虑发展那些需求收入弹性大的产品。当然,需求收入弹性大的产品有许多,并不是每一种都适合于上海去发展的,特别是作为今后出口主力的产品,更是需要仔细选择。总体说来,高收入弹性的产品科技含量比较高,在生产资料产品方面要体现当今最新技术水平或最优的性能价格比,在消费品方面则是具有高科技的高档品。虽然上海总体上说科技力量比较强大,但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强大。目前上海的科技力量与世界上的先进水平相比,还只能在几个方面先开展竞争。这就要求我们根据上海现有的科技力量和产业状况,在那些国际市场上需求收入弹性大,市场前景好的产品中选择一部分优先给予扶植发展,先使这部分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上海市政府已确定了要给予重点扶植培育的六大支柱产业。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也有可能增加一些新的产业。就目前情况而言,这些支柱产业对上海出口的贡献是微小的。在不少地方这些产业只是在替代进口方面发挥了作用,这和上海高速发展出口的战略有差距。我们认为,应该在市政府已确立的支柱产业中按以下标准选择一些重点培植的出口产品:(1)经过一番努力,我们在该产品的技术水平在短时期内就能达到或接近世界水平的。(2)需求收入弹性大,该产品在国际市场销售前景好的。(3)能够在国内形成大规模生产的。

比如,微电子工业,包括计算机及其网络通信产品就值得化大力气去扶植出口。据美国国际数据公司(IDC)报告,1996年全球个人电脑销售量增长率为16%,而1997年估计个人电脑销量增长率将为17%。有些国家的个人电脑销量增长率很高,如日本1996年的销售量增长39%,韩国为30%,印度为27%。技术含量高的电脑产品销售增长率会更高些。比如笔记本电

脑、服务器等的销售增长率就远远高于台式电脑的销售增长率。(见《中国贸易报》1997年2月28日)至于集成电路、芯块、已是各种机器设备、仪表以及家用电器所不可少的零件了,其市场前景十分广阔,而计算机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则是生产管理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微电子工业是各发达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重点发展的目标。

如新加坡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硬盘驱动器和声卡制造国,而台湾地区则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鼠标生产地,韩国半导体产业已成为美国、日本和欧洲各国的竞争对手,其半导体存储元件销售额已居世界第一,马来西亚现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半导体芯片生产国。这些都表明,电子工业是最值得优先发展的行业。而且由于其产品需求量大,适合于大规模生产,因此某一国、某一地较易成为某种电子零部件产品的世界主要供应国

我国的电子工业已有一定基础。“八五”期间共获2336项科技成果,其中新产品1560项,新技术、新工艺556项,新材料116种、新成套设备69项,获专利35件,攻关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有467项(见《中国贸易报》1997年1月31日)这表明我国的电子工业的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缩小。如果我们在专家论证的基础上,对电子工业给予进一步的支持扶植,把技术攻关的目标集中到几个重要方面,突破关键技术,形成自己的技术特色和知识产权,就能使自己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优势。

电子工业产品的重要性还在于,除了电子产品的直接出口外,还能把它和机电、仪表、家电、以及各个行业的产品结合起来,提高这些行业的产品质量和档次,从而提高国民经济的技术水平和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2. 对传统产品应提高科技含量和加工深度

培养上海新的出口主导产品,并不意味着把传统出口产品简单地替换掉。由于我国技术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必然使得劳动密集的纺织、轻工产品在相当时期内仍然会在我国的出口中担任重要角色。而且,从国际上看,发达国家并没有把纺织品完全放弃掉,在中高档的纺织品、服装的生产出口方面它们仍然占有优势。因此,上海的轻纺工业产品以及农副产品在扩大出口方面仍有很大潜力可挖。就纺织品服装而言,我国目前出口的基本上是低档产品,如果我们在面料处理技术上有所突破的话,就能大大拓展国际市场空间,并提高产品的售价。

从长远来看,相当一部分纺织、轻工产品会向我国的中、西部转移,但上海作为经济、贸易和金融中心,仍然应保留部分高档的服装、纺织品的生产和出口。另外,上海在纺织、轻工等产品的开发研究,以及这些行业所需要的机械设备的开发研究上应该保持领先地位。再加上上海在长期出口纺织品、轻工产品过程中形成的国际营销渠道和一些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就能使上海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在我国纺织轻工产品的出口中发挥“营运中心”的重要作用。

3. 加强科技投入,建立强大的研究与开发体系

现代生产的发展,越来越依赖科学技术进步,人们在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可以更深刻地体会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含义,一个国家的经济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与它在研究与开发方面的能力有关。同样,一个公司的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也与它在研究与开发上的能力分不开的。事实表明,相当一部分著名的跨国公司,都是通过研究与开发上占有某种优势,使自己在国际化生产上处于主动地位。

我国目前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相当一部分规模小,研究与开发的经费投入不足。至于广大的乡镇企业和从事来料加工的出口企业,更是缺乏研究开发能力。为了使上海的出口上一个台阶,政府应该鼓励外向型企业集团化,加大自身的研究与开发的投入,以科学(下转第63页)

责任。戴根有指出,对存款保险问题国内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国有银行暂时不能搞,信用社和其他银行应先搞;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这是一种歧视。王华庆认为在现有体制下国有银行暂不宜进入,因其①仍为国家独资;②资产存量风险大;③还有政策性业务。首先进入存款保险体系的是风险较大的其他银行和信用社。分两步走,不存在歧视问题,这是一种监管,从另一角度进行的监管,也不存在监管重复问题。易纲认为:①《商业银行法》公布后,国际银行评级机构对我国四大国有银行的评级降低,此前它们为主权级,该法规定商业银行可以破产,不再为主权级,风险增加,信用等级下降;②存款保险的要求对所有存款机构应该是一致的,存款机构风险等级的差别可从收费差别上体现,不能先搞一块,后搞一块,否则就乱了;③存款保险是政府行为而非保险公司行为。

七、金融风险度量、理性与非理性分析问题

与会者对金融风险的度量问题和理性与非理性分析问题进行了讨论。张尧庭(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认为,讨论金融风险首先要解决风险的度量问题。现在大学缺乏一门基础课程:度量课。经济学将风险视作一种效用或损失,但并非所有的风险都能用效用来度量。即使能用效用来度量风险,其效用函数的选择也要慎重。人在进行决策时并非都是理性的,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假定导致其模型结论脱离实际。王闻(南开大学国经系)从基本的噪声交易(非理性交易者以噪声而非信息为基础进行的交易)模型出发,分析了噪声交易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噪声交易使金融市场的存在成为可能,但又使其成为一个不完全有效的市场;同时还造成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和长期偏离其均衡值。他认为我国股市中噪声交易者过多,导致股市的有效程度不高和 risk 过大。60年代出现的理性预期分析对宏观经济学产生重要影响,80年代出现的噪声交易理论把视角转向非理性的分析,必将改变经济学家的思维,对金融和经济理论产生重要影响。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财务金融学院副教授;单位邮编为 200433)

(上接第 58 页)技术成果作为联系集团的重要纽带。这些出口企业集团应根据市场的发展趋势去预测未来的需求,预先开发新技术,并以这种新技术去引导社会的消费潮流。

各个行业的行业组织应该经常召开有关行业技术发展动向的研讨会,及时跟踪和了解本行业的最新技术动态,协调、促进本行业的各个大企业选准、选好重点科研攻关项目,涉及需要引进技术时,可以协调各家企业,尽量减少多头重复引进,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外方提价,肥水外流的局面。

政府设立专项技改发展基金,专门用于支持各企业引进技术、进行技术改造、开发新产品等活动。在各个行业专家论证的基础上所挑选出来的重要技术项目中,政府可以再在其中挑选一部分作为重点扶持对象。由各企业投标承担这些技术的研制、产业化和销售。中标的企业将得到低息或无息的发展基金去研制开发新技术,如果企业难以完成某项技术的研究开发,则可以由政府有关部门出面协调几家企业联合完成。这些联合攻关的企业可以根据事先达成的协议,分享得到的技术成果。

对于需要重点扶植的电子信息等行业,由于该行业对国民经济各行业、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技术水平关系极大,除了采用政府技改发展基金鼓励企业去研究开发新技术外,政府还可以对有关科技项目的研究提供其它的资金,协调高等院校、研究所和企业联合研究开发,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成为生产力的过程。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单位邮编为 200433)